

金石岁月里的温柔月色

钱 晟

(一)
陆康先生的刻刀在青田石上游走,沙沙的声响像极了旧时书房里翻动宣纸的轻叹。他说篆刻是“方寸之间的呼吸”——既要吐纳时代的气息,又要守住金石的古意。这些年,他曾把“时间都去哪了”“躺平”这样的新词刻进印文,旁人笑他“不古”,他却说:“写‘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现在没人喜欢,要写进人家心里。”这般直白,倒是晚明文人题在扇面上的俚语,俗中见雅,耐人寻味。

他每年办展,展品从不重复。“重复,写起来就没那么开心了。”这话说得任性,却透着老派文人的真性情。2024年被一抢而空的华宝楼那三百件旧作,如今都成了“前尘往事”,那些当年最鲜活流行的字句,随着岁月淡去了。倒是他说的“心中有光,脚下有路”,像极了书房里那盏不灭的孤灯,照着案头未竟的印谱,也照着时代变迁中不肯随波逐流的心。

(二)
陆康先生学艺的法子,颇有古风。他戏称为“偷师”,依我看倒不如说是“会心”。看展览,他只看好作品,“不好的东西像毒品,有迷惑性,研究了就会‘中毒’”。看到心仪的笔法,他笑道:“这五六笔里,有我偷他两笔。”这般“偷”法,倒像是《世说新语》里的名士,取人神韵而弃其形骸。

在刘海粟先生家中,


年少的他看到刚画完还未干透的山水,以及旁边“湿的毛笔”,从笔锋含墨的程度,窥见了大家运笔的秘密。这般观察,像极了古董商鉴赏字画,不只看笔墨,还要看纸绢的包浆。更有甚者,他留意到谢之光先生以“浓汤”调墨,“宿墨而成的浓汤倒进去不化,能画出不一样的效果”。这“浓汤”二字,用得妙极,让人想起江南老厨吊的高汤,也想起文人书斋里那些秘不示人的“独门绝技”。

(三)
陆康先生的艺术人生,是从他口中的“老公公”(即其祖父陆澹安先生)的书房里开始的。他说自己是“沾了老公公的光”,这话说得谦逊,却掩不住世家子弟的底气。“老公公”能背整本小说,晚上喝酒时讲“武松打虎”,那些故事里的英雄气,都化作了陆康刻刀下的金石气。

陆康先生感恩于我爷爷钱瘦铁对他少时的指导,与我颇多恩惠与提携。他赠我一枚青田朱文小印“人长久”,我常用。这方寸之间的情谊,既是对前辈提携的感念,也是对后学的期许。印文“人长久”三字,朱文婉转,布局疏朗,似有月光浸润其中,带着岁月静好的祈愿。每当我钤印于纸,那抹朱红便如旧时月色,温柔地照亮了艺术传承中的人情温度。

他见到的那些老先生,个个都是“名士派”。唐云先生像“唐伯虎”,待人随性,“拿东西问他好不好,他说‘好的,好的,送给你’”。这般洒脱,让人想起《儒林外史》里的杜少

今天,就写写我的奶奶吧,尽管她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四十多年了,尽管她与我的交集时间加起来可能都不会超过三个月。

马年春节,我和弟弟陪着母亲去了一趟父亲的老家张家港,探望了薛家仅剩的长辈——我的姑姑。家族的兄弟姐妹自然也是要相聚的,我父亲这一辈,是薛氏老太爷在张家港的第三代,我父亲是最小的弟弟,于是,我和我弟弟也成了第四代中最小的两个,我是“十八妹”,我弟弟是“十一哥”,也就是说,老太爷的曾孙子女总共二十九人。二十九人自然是不齐的,有的出国度假去了,有的已经移居外地,鲜少回乡。但也来了十多个,我们团团围坐,话题自然离不开家族往事,聊天中,我奶奶成了高频出现的人物。

二伯家的堂姐是“十五妹”,她的回忆总是带着戏谑:奶奶要是和我妈闹起矛盾来,哪怕她的嗓门比我妈大,哪怕她把我妈骂哭了,她都是不肯善罢甘休的,必须要我爸出面,奶奶立即闭嘴,背手、转身、进自己屋了……获胜者扬长而去,片刻出屋,给我妈一个笑脸相迎,简直就是个“戏精”。“十五妹”说完,率先哈哈大笑起来,所有人紧跟着轰然而笑。

奶奶在世时,一直与二伯家住一起,爷爷在我父亲年少时就已病逝。偶尔,奶奶也会被二伯送上长途汽车,颠簸大半天,到达上海长途汽车北站,再一路公交车辗转到浦东的我们家。接下去的一个月,奶奶会与我们生活在一起。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三五年才

达。众人品着“混血红酒”,倒像是品着人生的况味:苦乐参半,才是真味。

他的处世之道是“胃口要好,气量要大”。“人家骂你,就当是上帝来考验你。”这般调侃,透着上海老克勒的幽默与智慧。他引用郁达夫的诗“无边风月属闲人”,说“忙得一塌糊涂,风月都吹不到你身上”。这话,倒像是写给当下“内卷”时代的一剂清凉散。

(四)
近八十岁的陆康先生,把人生过成了一壶陈年普洱,醇厚,温润,有余味。他说快乐要有五个元素:健康、朋友、时间、情趣、金钱。这话说得实在,不唱高调,却字字珠玑。

他主张“及时快乐”,反对“好酒藏着等过年”。疫情时,朋友两瓶名贵的红酒被误混,他以“老和尚种兰花”的故事化解——兰花枯了,初心还在。这般通透,让人想起苏东坡“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

鼎的那一时刻,体会到了现世安稳。

对我来说,探花府就是一场梦,是镜花水月,就像丁宅砖雕门额上篆刻的“秉物游心”四个大字,虽写得那样的潇洒不羁,却不能走进一步。它弥漫的春天景象,不过是视觉幻象,麻醉了半梦半醒的皇帝,大清的天下早已千疮百孔。

安静地吃完丁家蒸菜后,端坐座椅,感觉在移动。似乎穿行迷宫或者信步闲庭,前一步是山色葱茏,退一步是春水清浅。一时在牡丹亭中凭栏,一时在西厢房里望月,到底惊醒了桃花扇扇上翩跹的蝴蝶。一时竟神思渺远,想起2023年冒雪观看苏剧《国鼎魂》,想起名角王芳扮演的传奇女子丁达予;还是说,那不是春天的雪,是潘祖荫的雪,是潘达予的雪。

相比佛罗伦萨的春,苏州是一座空气中有流水之声,有早梅绽放的江南古城,我见识了它最轻最软最慢的春。

暗香浮动,我们携手走出平江。隔着小河,平江路上的人熙来攘往,众声喧哗,热闹里,传来一句:“春天来了!”

十日谈

为春天存档
责编:殷健灵

有那么一次。

那时候,我父亲在十二公里外的工厂上班,要到傍晚才能下班回家。奶奶白天就和我母亲、我,以及我弟弟在一起。那些白天,奶奶到处串门,口音的不同并不能给她造成语言隔阂,她与街坊邻居频繁交流,充分显示了“社牛”的属性,竟也结识了不少中年以上

今天,就写写我的奶奶吧

薛舒

的女性朋友。然而,很多个傍晚,奶奶却总是在我父亲即将下班到家前一刻钟,准时把自己安顿在床上。

自行车铃声由远而近,在家门口戛然而止,“咔嚓”一声,上锁,随着我父亲工作皮鞋“蹬蹬蹬”的脚步声传进家门,里屋床上的唏嘘声立即刻开嗓:哎哟喂——哎哟喂——

儿子的嘘寒问暖给了那位躺在床上母亲无限的安慰,晚饭开始前,她的“头晕”不治而愈。可是当年我那年轻的父亲对女性的内心世界并无复杂与透彻的了解,他毫无疑问地责怪起了妻子在漫长的白天没有给予他母亲及时的关心与体贴。我母亲边笑边回忆:奶奶中午吃了两大碗饭,下午还出去逛了半天,一整个白天都正常,儿子一回家,就“哼哼”起来,我冤呐……

“九阿哥”用苏州口音的普通话说:奶奶

要发嗲喂!奶奶年轻时是个美女……

围炉茶话再一次被哄堂大笑打断。彼时,我正努力回忆着那位与我相处并不多,当年也还不算高龄的老人。在我的印象中,她佝偻的身躯,皱纹纵横的瘦小脸庞,所剩无几的身白头发在脑后挽出一个核桃大的发髻……似乎都与“美女”无甚关系。仿佛,在四十多年前,她就呈现出了一种无法再老的老态。那么,她作为“美女”的人生,究竟是在什么时代?这在我的记忆中竟是空白。

窗外吹进一缕冷风,我的表哥,我奶奶的外孙子站起来,为坐在正中间的姑妈紧了紧脖子上的羊绒围巾:姆妈,冷不冷?当心感冒哦。

在我们的嬉笑闲聊中,八十七岁的姑妈始终端端而坐,不插嘴,却总是跟着我们一起笑,眼角布满皱纹,她有着略微浑浊的眼球,眼眶里汪着一层浅水,也许是老沙眼,抑或是想念她的母亲,我的奶奶了。

表哥伸手揽了揽他母亲的肩膀,姑妈一偏身,在儿子的胸怀里轻靠一瞬,立即收回身躯,恢复了端坐的姿势,脸上笑咪咪的,像极了无欲无求的菩萨。

那会儿,“十八妹”突然发现自己竟有些想念奶奶,那个无论多老,无论是否依然保持美丽,都从不苛求自己克制某种需求的、爱撒娇的普通女人。“十八妹”觉得,她能看见那个“戏精”,就像看见自己。



薛舒

五岁到十岁,我住在东诸安浜路可以穿到愚园路去的一条弄堂里。那是1980年代中后期。我们住的是类似于旧里的老房子,直到现在,那条弄堂的布局,哪个位置住着哪户人家,我还能完全想得起来,历历在目。

后来我们家搬走了,再没多久,那里就拆迁了,盖起了当时常见的五六层的新公房。所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只要路过愚园路附近,就总会绕进去看看。房子虽然是新的,但弄堂还在,马路的曲线还是从前的样子,于是就能很快回忆起来——哦,这个地方原来是一家小烟纸店,那个转角以前有个大饼摊头。

又过了很多年,有一次我再次路过,发现那些新公房竟然被第二次拆迁了。马路被拓宽了一些,原本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凹进去的空间,是一家叫“大隆机器厂”的工厂。工厂搬走后,那块凹地就被填平了,再造起来房子以后,格局已经完全两样,弄堂也彻底没了。那时候,我就有了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我们希望通过保存记忆,将眼前这个陌生的地方和我们经历过的一段人生联系起来。

前几天,我正好又经过那边。整条马路被完全“拉平了”,从江苏路到镇宁路之间,你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从东诸安浜路穿弄堂抄近路到愚园路了。那里现在是一个大豪宅,我看到上面写着“壹公馆”。我站在那里,眼前的一切,与我的记忆、与我曾经有过的家,已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关系了。可是,每次我走过那里,依然会觉得,对我来说,它和上海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仿佛总有一个定格的镜头,能穿过那一次次叠加的变化,保存在大脑的深处。

正是这种想要“安放记忆”的冲动,促使我和导演陈意心从一年半前开始做上海人“搬场”的系列采访,至今采访了40余位上海人。

不得不承认,任何一个人,对自己曾经属于过一个空间,是有点执念的。甚至老房子里的家具怎么放,餐桌上是垫玻璃板还是台布,这些细节,都和某一段人生紧紧结合在一起。对我们上海人尤其是40岁以上的上海人,搬场还有着更特殊的意义:我们大多数经历过住得很窘迫的时光,并通过个人的搬场见证了上海盛大的变迁。

所以,对受访者,我说的第一句话总是:“你还记得老房子的门牌号码吗?”

这个号码是一把钥匙,一旦插入,记忆的闸门便缓缓开启。每个人的记忆之河起初都像是一条若隐若现的小溪,慢慢汇合成奔流的大海。好多次,我和口述者会在叙述的间隙,共享一种轻微的哽咽。

这种记录并非简单的怀旧。我曾在华盛顿美国国家博物馆的1700多万件文物中,被一座普通家庭的房屋模型深深震撼。并非宏大的历史,这座记录了一个普通美国国家150年房屋变迁的模型,将房屋修缮单里的岁月、父亲曾对孩子说过的一句话、母亲做饭的气味、孩子体育课后的汗水……一一记录和保存。

因此,追踪一个个平凡或不平凡的人的搬场故事,保存我们的个体的记忆,或许正是为了回应这个问题:当我们说“上海”时,我们谈论的不仅是外滩的灯火与陆家嘴的天际线,更是千万个在这里哭过、笑过、挣扎过、热爱过的具体的人。我们的故事,一起回忆和讲述搬场这件事,梳理自己家庭的一段历史:搬场之前,搬场之后;离开的那个家,和去往新的家;曾经和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一起的家,到现在可能都分开了。

但你还有一个家。
你的人生还在继续。



曾三颜四
禹寸陶分
(篆刻) 王鸿定

就坐下来用筷子点一下小桌上5、6个小碟子里的小菜,每样一点点,喝一杯酒要吃五六点钟头的老太。陆康喜欢陪着谢先生“溜溜马”一样散步,回来了老太太依然还在眯着酒。这场场景,像是张爱玲小说里的插图,老旧,却温暖。

他整理祖父陆澹安先生20年未开的箱子,抢救出信件、日记,出版11本书籍;将陆澹安先生留下的1955—1966年的百余本报纸合订本无偿捐赠新民百年报史馆,纪念新民晚报创刊96周年“九六拾贝”——这些事,他做得从容,像是在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那些泛黄的纸页,是岁月的注脚,也是文化的传承。

(六)
陆康先生的篆刻艺术,是他人生哲学的物化。方寸之间,有时代的呼吸,有古意的留存,也有个人的性情。他说:“开始是昨天的结束,结束是明天的开始,告别昨日,重塑自我。”这话,像极了他刻刀下的边款——既有对过去的告别,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心中有光,脚下有路。”这光,是艺术之光,是学养之光,也是人性之光。在浮躁的时代,陆康用他的刻刀,用他的文字,用他的生活,为我们留住了一份“旧时月色”——那是文化的温度,是岁月的质感,也是我们在这个喧嚣世界里,可以安放内心的所在。

搬场

王 路



侄女开心从国外留学归来,我约她在平江颂吃午餐。她赠送一枚波提切利名画《春》的书签,我恍悟春天悄悄来了。一抬头,雨雪纷飞中,一树红梅芬芳吐蕊,花朵层层叠叠。

经过艰苦的整修,平江颂(丁宅)重新开放,青砖、铺地、盆景、假山、木料被重新唤醒。古宅的一切,仿佛都回到了它本来的样子。光线微微颤动,从窗外射进来,依旧是那么干净,仿佛一只纤纤素手,轻轻拭去时间的尘埃,从精致繁复的丝缎花纹上掠过,也拂去它曾经的快乐与哀愁。

平江颂(丁宅)——一个苏州女子的成长乐园,其实,自建成后,丁达予一天也没住过。因丁宅是清代古宅,原址在大儒巷6号,为四进两层砖木结构控保建筑,于2011年9月被政府整体移建到大儒巷54号。主人丁春之是晚清县令,其女丁达予18岁嫁入潘家,入住探花府(晚清朝廷重臣潘祖荫家族),惜人丁单薄,丈夫早逝,20岁的潘达予临危受命。

位于南石市街的探花府,是收藏大家潘祖荫的秘密花园,它真正的秘密是:藏匿西周青铜器大克鼎、大盂鼎。
透过窗户看庭院,草木竹树掩映下的亭台楼阁,显得分外清新。假山蜿蜒起伏,一条流瀑从独峰顺

势而下,轰鸣声声。我静静欣赏明珠溅玉,感受那个水般女子的柔美、灵活。

抗战期间,沉着的潘达予在家人的协助下将大克鼎、大盂鼎深埋地下,躲过侵华日军的数次搜查;又将书画古籍装箱秘藏。历经乱世,以一己之力默默守护国宝。哪怕蝴蝶翻飞花丛发出的微响,也会让她担忧不安。无论探花府有多少品梅煮茶般的风雅,纵使花园里

蝴蝶计算的春天

范 婉

种满了文徵明之兰、苏东坡之竹、周敦颐之莲、陶渊明之菊,还有几条庄周所知之鱼,风花雪月都不是花园的主题。润物无声,才是花园的本质。

泰戈尔说:“蝴蝶计算的,不是月份,而是刹那,蝴蝶拥有足够的时间。”耐心的等待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春天,潘达予在刹那便做出决定,将守护几十年的双鼎主动捐献上海博物馆。

开心提起,去年今日此时,正是立春时节,我们探访过富丽精致的探花府,回廊粉墙上悬挂着双鼎的巨幅照片。探花郎留下的物质遗产,散发出中华文明的绚丽光华。我在上海博物馆看见实实在在的大

明起刊登
一组《今天你还
写日记吗》,责
编郭影。